

文苑笔谈

趣话“九九消寒图”

冬至,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。古人认为:“冬至,阴阳百物之始,日极南,影长,有履长之庆。”

此日,皇家行“腊祭”之礼,官府与民间亦各相庆贺,称为“冬节”,因而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

“一阳初起处,万物未生时。”

冬至被视为阴阳转换、冷暖交替的转折点。古人常以“数九”来记录冬日寒意渐消的过程,这一习俗最早见于南朝荆楚地区,即“从冬至次日数起,至九九八十一日,为寒尽”。江浙一带则从冬至日数起,故有“春打六九头”之说。这种朴素的生活智慧,经过百姓口耳相传,逐渐凝练为朗朗上口的“九九歌”。早在南宋时便已有“一九与二九,相逢不出手”的民谚。我国幅员辽阔,各地传诵的“九九歌”各具特色,如北方民谣所唱:“一九二九不出手;三九四九冰上走;五九六九,沿河看柳;七九河开,八九雁来;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。”在这漫长的“数九”寒天,古人还创造出一种雅致的迎春方式——九九消寒图。

相传此图为民族英雄文天祥所创。南宋祥兴二年(1279年),文天祥抗元失败,被囚于大都(今北京)狱中。适逢冬至,为计时遣怀,他于狱壁之上画寒梅一株,枝缀九朵,每朵九瓣,每日染红一瓣,待满树皆红,便是春回大地之日。红梅



故宫养心殿燕禧堂陈设复原场景,其中悬挂的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题字,是清代宫廷“写九”式九九消寒图,为清宫岁时消寒的传统风物。

窥其详。明末《帝京景物略》记有两种消寒图形制:其一为“画梅法”,即“日冬至,画素梅一枝,为瓣八十有一,日染一瓣,瓣尽而九九出,则春深矣,曰‘九九消寒图’”;其二为“画圈法”,即“有直作圈九从,从九圈者,刻而市之,附以‘九九之歌’,述其寒燠之候”。后者因“歌图合一”,兼具时令记录之用与歌谣传唱之趣,故流传尤为广泛。

与“画九”相似的还有一种“写九”的文墨游戏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幅葫芦形消寒图,全诗每句诗写一九,共三十六句二百五十二字,依诗句顺序绘成葫芦形

图案。诗文从“头九初寒才是冬,三皇治世万物生”写到“三桂令兵下南去,我国大清坐金銮”,可推知该图制于清初顺治年间。尤为特别的是,图中“雁南飞哉柳芽待春来”中的“雁”“芽”“来”都不是九画,但这九个字的繁体字笔画之和为八十一画,已初具“九九消寒图”的雏形。道光初年,据吴振棫所著《养吉斋从录》记载:“御制‘九九消寒图’,用‘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’,九字,字皆九笔也。懋勤殿双钩成幅,题曰‘管城春满’。”此处巧用韩愈《毛颖传》中的毛笔雅称“管城子”的典故,寓意笔墨书春、满城芳华。该图至今仍悬于故宫养心殿燕禧堂内。另有一幅御制“春前庭柏风送香盈室”消寒图,双钩字内不仅填满朱色,更以细笔随形标注天气,长短笔画间巧妙安排文字,读来趣味盎然。

清末,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载:“消寒图乃九格八十一圈。自冬至起,日涂一圈,上阴下晴,左风右雨,雪当中……此事予儿时曾为之。”让廉《京都风俗志》中亦有“每日分阴晴,涂一圈记阴晴多寡,谓之‘九九消寒图’,以占来年丰歉”之句。有歌诀曰:“上阴下晴雪当中,左风右雨要分清。九九八一全点尽,春回大地草青青。”如此日积月累,即成一份翔实的冬日气象档案。另据单士元《小朝廷时代的溥仪》及清宫档案记载,溥仪儿时曾用“寒梅吐玉”“管城春满”及“消寒益气歌”等消寒诗,其所编词句多记录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诸事,如“冬至头九天气寒,项城有意坐金銮”。中华帝国号洪宪,施行专制改江山“九五未登身先丧”“黎大总

统掌兵权”等句,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变幻。

民间版本的消寒图,则充满朴拙的生活气息。天津杨柳青、河北武强等地,均将这一传统融入木版年画创作。例如杨柳青年画中有一幅“娃娃图”,图上的童子手举九枚铜钱,上写“原是活财神来到咱家”,其中“原”“财”“来”等字(繁体)写法均有调整,皆为凑足九画,构思巧妙;另有一幅“娃娃戏”,图上的七名童子或摇旗呐喊,或舞枪弄棒,所演正是《洪洋洞》《破红尘》《南阳关》三出经典戏文。戏名也特意选用双钩九画字,别具新意。河北武强年画“九九消寒农历图”,主体为三个小娃娃,周围环以十二生肖,四角饰四季花卉,娃娃手中分别拿着苹果、桃子和柿子,代表平安、长寿、如意。宁河一带则流行以八十一枚铜钱图案连缀成图,填涂规则与记录天气的消寒图相仿。农家常把消寒图与黄历一同贴在灶头,每日点染一笔,成为寒夜里温暖的仪式。这些各具巧思的创作,赋予了消寒图驱邪纳祥、丰收富足的美好寓意。

此外,文人之间还流行一种“九九消寒联”,每联九字,每字也是九画,每日在上下联各填一笔,联成而九九尽。这实际上是由“九九消寒图”扩展而来,民间又称之为“数九迎春联”,如“幽柏玲珑浓荫送秋残,柔柳轻盈香茗贺春临”“春泉垂春柳春染春美,秋院挂秋柿秋送秋香”“故城秋荒屏栏树枯荣,庭院春幽挟巷草重茵”等。据统计,汉字中九画字最多,约占11.1%,这为构思消寒句或消寒联提供了丰富素材。

到了汝城,才知道从前多少有点小看它了。

汝城县与赣南崇义县相邻,隶属于湖南省郴州市。我此番前来,主要是想寻觅理学鼻祖周敦颐的些许遗迹。此前问过崇义的朋友,汝城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地方。但他们能说的并不多,甚至对周敦颐一无所知——这其实也不难理解,如今能坚持阅读的人本就不多,普通对周敦颐的印象,多半只停留在学生时代语文课本里的只言片语,至于背后更深层的历史脉络,自然鲜有探究。

厦蓉高速公路通车后,从赣州到汝城,竟比去本地不少县城还要便捷。车子刚下高速公路,便看到一块“理学名城”的大型广告牌。如此看来,汝城对周敦颐这一人文资源的挖掘与重视不言而喻,非但没有搁置“理学”这篇文章,反而大有深耕细作、追本溯源的意思。汝城确实有理由深耕周敦颐这一文化资源。北宋宗时期,周敦颐曾在此任县令四年,彼时的汝城,还叫桂阳县。

周敦颐是理学开山鼻祖,在他曾任职的地方,若不发掘理学这一文化名片,未免可惜。不过在我看来,最具资质打出这张文化牌的,当数赣南的大余县。这个地方素有“周敦颐的起点,王阳明的终点”之称:周敦颐曾在这里开宗立派,收下后对发展理学起了重要作用的程颢、程颐两兄弟为徒;而在理学发展史上声名卓著的王阳明,最终病逝于大余。我想,赣南的相关地区应该增强几分文化发掘的紧迫感。

提及周敦颐,总绕不开濂溪书院。因他晚年在江西庐山莲花峰下筑“濂溪书堂”定居,世人便尊称他为“濂溪先生”。汝城自然也有濂溪书院,在其城一隅的山脚下,环境清幽。据介绍,这座书院始建于南宋宋宗嘉定十三年(公元1220年),历史悠久。眼前的建筑是一座两层高的四合院,最近一次修缮是本世纪初,院内新铸了周敦颐雕像。院子是砖木回廊结构,需拾级而上,平添了几分庄严肃穆。楼上楼下都布置了相关展室,不仅可以了解周敦颐生平事迹,还可以了解理学的发展脉络。其中便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“周敦颐著述”。

周敦颐流传后的诗文总计不过六千余字,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,究其原因,除了作品本身质量高以外,更在于他的弟子成就卓越,将他的学说发扬光大。由此可见,一个人即便学识渊博,也需要善于传道授业。有了优秀的继承者,其思想与学说才能代代相传。纵观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大家,如孔子、王阳明,都是如此。试想,若没有弟子的追随记录与传承阐发,又何来《论语》《传习录》这样的传世经典呢?

展厅以周敦颐的生平为主线,突出本土元素,包括湖湘文化对汝城的影响等内容。对普通读者来说,周敦颐的作品当中,《爱莲说》的影响力也许是最大的。今人讲廉洁,往往喜欢引用它。书院专设一个“廉政与法治”展室,陈列了廉政图文、廉政家训、吏廉民事、法治故事等展板。

濂溪书院对面的山下,是濂溪公园。全国多地建有濂溪公园,基本上都是后人为缅怀周敦颐而修建的休闲之所。虽说这些公园与周敦颐本人并无直接关联,但借他的名号,便多了一条传播他的事迹与思想的途径。公园里有几个小朋友在玩耍,有个孩子甚至爬到正中那块刻有公园名字的大石头上去了。此刻,他们或许对公园承载的文化内涵懵懂无知;但等他们长大成人后,说不定某天会想起,自己从小就知道一个叫“周敦颐”的人物,知道他的诗文,知道他的事迹……

这便是文化的熏陶,它如同空气般悄然无声,却时刻浸润着我们的生活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。

县城还有一处少见的景观,是一座巍然耸立的古塔。平日里所见的塔多建在高地上,这座塔却建在平地。塔名“文塔”,始建于明成化五年(公元1469年),现存建筑为清光绪年间重建。“文塔”一名,顾名思义,是为振兴文脉而建,寄托着当地人希望家乡多出文士的期许。重视文化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。从长远看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文化的力量最持久。这座塔高七层,青石为基,青砖至顶。九塘江与寿江在塔旁交汇,水面不宽,有桥沟通两岸。塔下人气甚旺,大家各得其乐,相处融洽。

有意思的是,当地最初建塔是为了培育人才。可到了清代道光年间,人们却因科举考试失利,迁怒于这座塔并将其损毁,直至光绪年间,才在现址重建。事实上,一个地方的文风兴衰,从来与塔无关,更重要的是文化氛围、教育方式。周敦颐同时也是教育家,他每到一处,都十分重视兴学育人,对当地的风气教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反观一些文化底蕴薄弱的地区,往往长期缺乏知名的文化贤达到访讲学。由此可见,言传身教的力量最为直观。汝城虽是一个山区小县,历史上却涌现出不少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以古代为例,明代曾任两广总督、太子太保的朱英,曾任监察御史、福建布政使的范辂(县城的绣衣坊便是为范辂而建),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在当代,这里走出了开国上将朱良才、李涛,还有诗人朱子奇等。人们常说一个地方“人杰地灵”,其实与当地积淀的深厚文化风气不无关系。

汝城文气,润泽千秋。离开小城时,我不禁回头多看了几眼。如果有机会,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,还可以再次细品。



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濂溪书院(图片来源:红网时刻)

李伟明

汝城文气

少年成长与生态守护的诗意图交响

刘敬

卡夫卡在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:“一本书必须是一把斧头,劈开我们内心冰封的海洋。”当我合上陈伟军所著的长篇儿童小说《神鸟的岛屿》,恍然惊觉,这把斧头早已劈开了我心中那片封冻已久的海域,让温暖的海风裹挟着神话之鸟的鸣叫,在血脉深处掀起经久不息的波澜。

今年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提出20周年。这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的《神鸟的岛屿》,是青年作家陈伟军的又一力作。小说以中华凤头燕鸥保护的真实事迹为蓝本,将“硬核”科普与少年成

长巧妙相融,以少年视角反映生态保护主题,可谓匠心独运。

中华凤头燕鸥的学名为黑嘴端凤头燕鸥,它是世界极度濒危鸟类、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,由于极为罕见、踪迹神秘,这种鸟类被称为“神话之鸟”,全球仅存200余只,每一只的生死都牵动着整个生态系统的神经。中华凤头燕鸥在陈伟军笔下被赋予双重神性:既是自然界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,又是照亮人类精神荒原的明灯。陈伟军以无比细腻的笔触,将这个背部与翅膀晕染浅灰、头上顶着黑色凤冠的精灵,描绘得如此鲜活灵动——它们“矫健地翱翔于天际,显得那样轻盈飘逸,一如荣耀归来的王者”。但陈伟军的高明之处在于,他并未将笔墨停留在物种保护的表面叙事,而是以神话之鸟为棱镜,折射出更为广阔的人性光谱。

小说中那群守岛人,何尝不是另一种“神话之鸟”?哥哥江大鹏从西北黄土高原奔赴东海荒岛,将青春钉在潮起潮落的礁石上;朱同教授穷尽一生追寻中华凤头燕鸥的踪迹,即使记忆被阿尔茨海默病蚕食,仍记得“要去宁波,去韭山列岛”;叶伯伯放弃城镇生活,重返无人海岛,只因“守岛更是守家”的朴素信念……这些人物让我想起里尔克在《杜伊诺哀歌》中的诘

问:“如果我们消失了,何处安放这些无家可归的事物?”陈伟军给出的答案是:在人类永不熄灭的守护意志里,在江大鹏们“青年与海”的誓言中……

少年江小鹏的成长轨迹,恰似一面映照当代教育困境的明镜。这个来自兰州的小学生,揣着对大海的蓝色幻想登上铁墩岛,却在晕船呕吐、蚊虫叮咬、老鼠蛇虫的连环考验中,完成了从“被保护者”到“守护者”的精神蜕变。当他将新生雏鸟命名为“鹏飞”,当他颤抖着为受伤的燕鸥解开渔网,当他顶着暴雨修补漏水的屋顶——这些细节组成的,不正是中国少年最稀缺的生命课程吗?同样,作者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直抵灵魂深处的问题:当马睿们被囚禁在补习班的牢笼里,对着手机屏幕羡慕“另一个少年在看你看到的海”时,我们的教育是否正在批量生产着“看不见神话之鸟的眼睛”?

书中最令人动容的,还有海峡两岸的守护者谱系。台湾女孩林芊芊继承外公朱同的遗志,用画笔记录神话之鸟的每个瞬间;她的母亲朱与蓝博士扎根海岛,将燕鸥招引技术从理论变为现实……当林芊芊与江小鹏勾指起誓“拉钩上吊,一百年不许变”时,那稚嫩的童声何尝不是对两岸共同文化基因最



中华凤头燕鸥(图片来源:浙江省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纯净的诠释?

《神鸟的岛屿》最动人的力量,在于它揭示了守护的本质——不是悲壮的牺牲,而是日常的坚持。江大鹏们日复一日地清理水池青苔,月复一月地记录燕鸥数量,年复一年地修补被台风摧毁的设施……这种坚持,恰如“神话之鸟”年年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的漫长迁徙,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有生死相托的承诺。陈伟军通过叶伯伯之口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:“当很少有人愿意做某件事的时候,那么这件事就更值得去做了。”这句话像

一记重锤,敲打着每个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的现代灵魂。

掩卷细思,《神鸟的岛屿》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吗?当全球生态系统如铁墩岛般脆弱,当传统文化似中华凤头燕鸥般濒危,当纯真童心像海沙上的足迹般易逝,我们是否也需要建立自己的“观鸟屋”,在喧嚣中矢志守护那些易碎的美好?这部作品给出了温暖的答案:只要还有人在乎,神话就不会终结;只要还有孩子能看见燕鸥起舞,希望就永远在浪花间闪烁。

周永年的藏书、修书与读书心法

刘广荣

周永年(1730—1791),字书昌,济南历城人。他是清代响当当的读书人,著名的藏书家,也是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创议人。周永年青年时代即嗜读书与藏书,后任翰林院编修,协助纪昀(纪晓岚)编纂《四库全书》,《四库全书》编成后,由纪昀编撰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及《简明目录》,周永年分担释文、道家典籍的编写。

周永年把藏书当作人生的最大快乐。据《续修历城县志》记载,周永年“方四五岁时,过书肆,遽出荷囊中物,购《庄子》”。周永年小小年纪就把自己攒下来的钱用于购书,多么难得啊!后来,周永年在泺源书院读书,更加喜爱购书和藏书。主讲沈起元对他非常赏识,称赞他:“其文矫然,其气凝然,百无嗜好,惟嗜书。历下书不易得,生故贫,见则脱衣典质,务必得,得则卒业而已。”周永年的书斋称“水西书屋”,由他自己亲笔题写,并自编藏书目录,此周永年的藏书已有五万多卷。

乾隆三十六年,周永年中进

士,开始其京官生涯。当时北京大大小小的书肆很多,尤以琉璃厂一带最为有名,“内城福隆寺,遇会期多有卖书者”,这些庙会的书摊往往出售不全的零本书,价格低廉,如果想要凑全,需要不断跑去搜罗。周永年的好友、青州藏书家李文藻此时也在京城,两人常结伴去书肆淘书。据李文藻《琉璃厂书肆记》记载:“吾友周书昌遇不全者亦好买之。书昌尝见吴才老《韵补》为他人买去,快怏不快。老韦(书肆商人)云:‘邵子湘《韵略》已尽采之。’书昌取视之,果然。”《琉璃厂书肆记》又载:“朝食后即至厂,手翻至脯,间有典衣买之者。”周永年前往琉璃厂买书,一去就是大半天,翻阅后觉得书值得买,但带的钱不够,就典当衣服。周永年前往德州书院讲学,“出门每以五车(书)自随”,其藏书之多可见一斑。但令人遗憾的是,周永年去世后,由于生前刻印图书欠下一屁股债,很多书被拿去抵债,藏书所剩无几。

早年间,周永年和桂馥在济南

少有个人专著传世。所幸,他编撰了《先正读书诀》一书,为后世读书人树立了榜样。

《先正读书诀》是周永年饱览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的著作后,博采众长总结而出的读书方法和经验。全书采集荀卿、朱熹、韩愈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黄庭坚、范仲淹、宋濂、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三十多位名人的著作46部,分为192条,其中选择最多的是朱熹、陆九渊、王阳明三人。周永年在《王大准序》中说:“世之学者,或失耽吟,或失隐怪而拘迂,矧急功名,营利禄、徇风气、好辩杂耶!于戏,读书而能识圣贤要旨,味经史精腴,通古今常变,正国家经权;穷则著为文章,达则政行利济,岂易学哉!”他希望青少年读书切勿急功近利,要懂得国计民生。

周永年对朱熹的读书方法津津乐道。比如,朱熹说:“读书之法,须是从头至尾逐句玩味。看上字时,如不知有下字;看前句时,如不知有后句。看得都通透了,却又

从头看此一段,令其首尾通贯。然方其看此段时,亦不知有后段也。如此渐进,庶几心与理会,自然浃洽,非惟会得圣贤言语意脉不差,且是自己分上身心义理,日见纯熟。若只如此匆匆检阅一过,便可随意穿凿,排布硬说,则不准会得经意,于己分上亦有何干涉邪?且如看此幅纸书,都不行头直下看到行尾,便只作旁行横读将去,成何文理?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)

朱熹认为,读书不可贪多,要精熟。他主张读完一本书,再读另一本书,不要泛泛而读。读一本书时,要耐住性子,逐章逐节地读,理解了前面的章节,再读后面的章节,这样就不会断章取义。读书亦要从易到难,由浅入深,不要囫囵吞枣。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获不大,主要是读书不够“熟”和不够“精”。周永年对陆陇其的读书方法也很赞同——读书与